

外出务工经历、邻里关系与返乡 农民工创业

张梁梁, 李世强

(长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 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是“双创”背景下妥善处理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问题的重要途径。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积累的多元要素禀赋是其迈过初创门槛的关键因素。运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系统分析了包括外出务工经历在内的宏、微观因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影响,并重点探究了邻里关系的多维调节效应。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开展自主创业的概率。相比于宏观创业环境,返乡农民工在作出创业决策时更加关注自身要素禀赋的丰裕程度。对于主观幸福感较高、不公平感强烈、未参加短期技术培训以及西部地区的返乡创业群体,外出务工经历对自主创业行为表现出较强的促进作用。邻里关系对外出务工经历与返乡农民工创业具有正向调节效应,邻里间的支持作用、同群作用以及示范作用均是调节效应的有效渠道。以上结论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依然成立,从而为激发农村创业内生动力,尽快实现乡村产业与人才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 外出务工经历; 返乡农民工创业; 邻里关系; 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22) 02-0140-15

DOI: 10.3969/j.issn.1000-4149.2022.00.002

一、引言

随着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步伐的有序推进,流动人口的户籍约束逐渐放松。在城乡收入差距、教育医疗保障等诸多不均衡现象的推动下,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镇地区,出现了传统意义上的“外出务工潮”。然而,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户籍壁垒下的

收稿日期: 2021-09-21; 修订日期: 2021-12-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资本视角下新时代幸福悖论的演化特征与治理对策研究”(18CJL048)。

作者简介: 张梁梁, 经济学博士, 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李世强, 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

公共服务缺失以及疫情危机导致的市场低迷等因素,造成了农民工在社会网络与心理认同等层面难以融入都市生活^[1]。在此背景下,大量农民工主动或被迫选择离开城市,进而演变成新一轮的“返乡就业潮”,并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有愈演愈烈之势。此外,飞速发展的农业技术间接降低了单位产出所需的劳动力投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了闲散人员基数。如何有效提升农村人口就业率已成为推动农村产业发展、改善村民民生福祉,乃至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在中央“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基调下,各地区积极探索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的可行路径,不断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问题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经验。返乡农民工不仅通过自主创业实现了自身再就业,还基于其创业行为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进一步吸纳了周边村落的闲散人员。中国农业农村部官网数据显示,在国家政策鼓励与疫情冲击下,2020年返乡创业人员预计比上年增加160多万,带动农村新增就业岗位首次超过一千万^①。返乡创业已成为当下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活跃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

不止于时代背景与实践价值,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与决策机理同样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已有文献大多基于返乡人员的微观特征、要素禀赋以及面临的政策环境,探究各因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和绩效的综合影响^[2-4]。农民工外出务工对返乡创业行为的经验分析则受制于差异化的调查群体、指标选取以及估计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大多数文献支持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工返乡后的创业概率。外出务工经历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缓解了创业初期的融资约束,拓展了联结外界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都是正向影响的实现路径^[5]。不同类型的务工岗位、创业项目和外出区位所表现出的创业绩效回报具有显著的异质性^[6-7]。

梳理现有文献不难看出,学术界对外出务工经历与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作用方向与实现路径仍存在一定争议。利用全国性的微观调查数据,综合运用恰当的实证方法,得到异质性返乡创业群体的稳健结论是本文的首要任务。此外,本研究还重点考查邻里关系对外出务工经历与返乡创业的调节效应,力求进一步完善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的理论体系。通过返乡创业视角的有效切入,为激发农村经济内生动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提供稳健可信的理论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自主创业是劳动者对其所拥有或通过努力能够获得的创业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并创造出更大经济效益或社会价值的过程^[8-9]。创业资源通常包含了创业者自有的资金、技术、经验、信息、社会关系等要素禀赋,是进行创业活动的前提基础,直接决定了自主创业的成功概率和后期绩效^[10-11]。相比本地留守村民,外出务工使农民工获得了相对丰厚的劳动报酬。在满足日常消费需求后,剩余储蓄可用于投资行为,因此返乡农民工拥有较高的初始禀赋^[12]。除了外出务工期间积累的物质财富,大多数农民工还在长期实践中掌握了一些专业技能,开阔了眼界和见识,这些都是他们返乡创业的优势所在。此外,外出务工经历还极大地拓展了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帮助农民工破除创业渠道闭塞和信息偏误等难题^[6,13]。

① 数据来源: http://www.moa.gov.cn/ztzl/nyncfzcyj/202012/t20201229_6359100.htm

值得注意的是,长时间外出务工无疑损害了嵌入在乡土社会与亲缘地缘中的家乡社会资本,不排除会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14]。外出务工经历之所以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表现出积极作用,主要源于积累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中和了外出期间损失的本地社会资本^[15]。许明在控制农民工外出务工自选择问题的情况下,发现外出务工导致返乡农民工本地人脉资源和个人信用丧失,降低了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成功率^[16]。另有研究表明,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在多数情况下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那些因为经济因素或政策限制无法在城市立足的返乡农民工群体,对待自主创业的态度与留守村民并无二致^[17]。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影响农民创业决策的核心因素早已不是传统“小作坊”模式下家庭成员能否各司其职与分工合作,而是演变为融资成本、管理理念、销售渠道等现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机整合能力。外出务工经历对于返乡农民工缓解初始融资约束、提升管理能力、拓展网络人脉均展现出积极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外出务工经历显著促进了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

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地区具有典型的关系型社会特征,邻里间的网络关联、秩序规范与社会互动相比城市更加频繁。在特定语境下,嵌入在乡土文化中的同侪关系对认识农村人际互动与村民行为决策表现出强大的解释力^[18]。作为社会关联度极强的家庭决策行为,返乡农民工创业还受到家族势力、亲缘结构、地缘关系等诸多需要借助群体网络关联才能发挥作用的非自有资源的影响^[19]。邻里间的网络关联不仅是返乡农民工可调动的创业资源,对提升创业群体的机会识别能力同样大有裨益^[20]。同质性的粘合网络与互惠互助的认知预期是农民工开展返乡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邻里信任互助度和创业认知统一性有效提高了农民创业的成功率^[21-22]。

由于传统儒家文化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潜移默化,中国居民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决策容易受到身边人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熟人社会”特征^[23]。鉴于农民创业行为面临着多重维度的信息失真,在不确定性风险大到个体决策者出现认知困难时,潜在创业者一般倾向以群体偏好为行动参照系。邻里关系的同群效应为有创业意愿的返乡农民工提供了可借鉴与模仿的成功先例,激励了返乡农民工积极开展自主创业活动,形成了“鼓励创业、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氛围。除了上述交流协作渠道与知识技能溢出,邻里关系还在乡土社会中表现出较强的示范功能^[24]。邻居相对宽裕的生活条件和积极拼搏的冒险精神在圈层密集的农村社区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带动性,进而增强了农民对事业成功的渴望和开展创业实践的动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控制微观属性与地区特征后,邻里关系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邻里关系的客观存在提升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行为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 邻里关系对外出务工经历与返乡创业行为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1. 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部分选取了嵌套于城市层面的微观调查数据。调查样本来源于2016年中国劳

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CLDS 2016 通过对全国 29 个省级单位的城乡村居开展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逐步建立了以劳动力为调查对象的综合性数据库，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科学系统的社会调研数据。样本初步选取了目前居住在农村，且年龄在 16—64 岁的劳动人口。通过对样本缺失值、逻辑错误值和界定模糊值的数据清洗，最终得到 8346 个有效样本。宏观数据主要来源于当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少量缺失数据通过查找《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对应省份的统计年鉴补齐。

2. 变量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创业行为。CLDS 2016 调查问卷将农村劳动力的工作状态分为雇员、雇主、自雇和务农四类，借鉴谢勇和杨倩的做法^[7]，我们将雇主和自雇定义为从事自主创业行为，赋值为 1，其他选项视为非创业状态，赋值为 0。由表 1 可以看出，创业行为的平均值为 0.11，即每百名村民有 11 人选择自主创业，说明我国农村个体进行创业活动的积极性较低。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与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创业行为	1=雇主和自雇，0=务农和雇员	0.1105	0.3135
外出务工经历	有外出务工（跨县流动半年以上）经历（1=是，0=否）	0.2115	0.4084
年龄	2015 年时受访者实际年龄	47.6561	13.0072
性别	1=男，0=女	0.5335	0.4989
受教育年限	接受教育的年数	7.0404	3.7582
政治信仰	1=中共党员，0=其他	0.0524	0.2228
宗教信仰	1=有宗教信仰，0=无宗教信仰	0.1257	0.3315
健康水平	自评健康状况（1=非常不健康，2=比较不健康，3=一般，4=比较健康，5=非常健康）	3.5213	1.0088
技术培训	1=参加过，0=未参加	0.0521	0.2223
婚姻状况	1=有实质婚姻关系，0=实质单身	0.9071	0.2903
相对收入	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1=非常不满意，2=比较不满意，3=一般，4=比较满意，5=非常满意）	3.1465	1.0534
外出务工单位	1=政府部门及社团，2=各类企业单位，3=个体经营	2.7974	0.4453
经济发展水平	各地区 2015 年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	10.4526	0.7271
基础设施	单位国土面积内的等级公路密度	0.9492	0.4580
市场化程度	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中的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比	0.2111	0.1427
对外开放度	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当年 GDP 比重	1.7437	1.7022
城市变量	1=大城市，0=一般地级市	0.1041	0.3054

注：1. 婚姻状态变量中有实质婚姻关系指与异性共同生活，包括同居、初婚有配偶和再婚有配偶；实质单身包含了其他剩余选项。2. 城市变量中大城市包括了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外出务工经历。CLDS 2016 中有专门询问劳动力流动意愿的部分，包含了外出务工的诸多细化指标。我们根据“您有外出务工（跨县流动半年以上）经历吗？”定义该变量，回答“是”的受访者定义为有外出务工经历，并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外出务工经历变量的平均值为 0.21，即每 5 人就有 1 人曾有过外出务工经历，表明外出务工在我国农村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侧面凸显了本文研究主题的重要性。同时，简单分组后可以得到，有外出务工经历的 1765 个农民工，返乡后选择自主创业的比例为 15.2%；

而留守本地的 6581 个村民选择自主创业的比例不足 10%，由此可以初步判断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民创业行为存在一定关联性。

农民创业决策不仅受到外出务工经历的影响，还不可避免地面临多种宏、微观因素的制约。参考尹志超、周广肃等选取协变量的思路^[12,14]，我们将可能影响农民创业决策的控制变量分为三类：个体层面的微观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信仰、宗教信仰、身体状况、是否受过技术培训、外出务工单位类型。家庭层面主要包括婚姻状况与家庭相对收入。此外，我们还控制了所在地区可能影响农民创业行为的宏观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度以及城市虚拟变量。相关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 1 所示。

四、实证结果

1. 基础回归

鉴于因变量是离散选择变量，实证部分的估计结果主要基于 logit 回归展开，并在表 2 的最后一列以 Probit 回归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同时，考虑到嵌套数据存在较高的组内相关性，这里采用基于地市级编码聚类修正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为了清晰地表述个体特征和宏观因素的作用方向，表 2 选择了地区固定效应下的逐层回归方法对模型系数进行估计。

表 2 中模型（1）只加入外出务工经历变量，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初步表明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工在返乡后有较大概率从事创业活动。在逐步加入个体特征与宏观因素后，该变量系数虽然有所减小，但估计结果依然在 1% 的显著水平下为正。说明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确实存在较为稳健的正向促进作用。究其原因，作为潜在创业者，返乡农民工的初始禀赋是他们迈过创业门槛的前提条件。农民工在外务工期间积累了大量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思维见识和眼界格局亦得到提高^[12,16]。此外，外出务工也是农民工重构和扩展人脉关系网络的过程。因此，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表现出显著的推动作用。

个体特征方面，农民选择自主创业的可能性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降低。这是由于年长者能够承受职业变迁风险的能力下降，重新进行职业规划并选择自主创业的动力不足^[4]。男性村民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比女性村民表现出更高的创业概率，这可以由农村家庭的角色分工解释。相比女性村民，男性无须在照顾家庭上花费较多精力，相对充裕的工作时间有利于开展持续的创业活动。同时，男性对未知风险和收益的偏好也要强于女性，能经受住创业初期的巨大压力。技术培训对农民创业的正向作用不显著，说明政府组织策划的技术培训对村民创业的针对性不足。考虑到技术培训多是以实用性的农业种养技术为主，经过短暂的言传身教便可以大幅提高农业生产力，这反而坚定了农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决心，加剧了维持现状的路径锁定效应。婚姻状况在 5% 的显著水平下抑制了农民创业行为，这是因为处于婚姻关系中的个体倾向于规避风险，在做决策时需要考虑到未来的家庭生计，稳定的工作符合有家室群体的需求。此外，外出务工单位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程度越高，返乡后的创业概率越大。务工期间从事个体经营本身就是一种微型创业行为，学习积累的经营常识和管理经验对于日后独立开展创业活动大有裨益。而作为雇员的农民工一般仅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对

表2 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logit 回归			Probit 回归
	(1)	(2)	(3)	(4)
外出务工经历	0.0525 *** (0.012)	0.0252 *** (0.010)	0.0280 *** (0.010)	0.0308 ** (0.011)
年龄		-0.0024 *** (0.000)	-0.0029 *** (0.000)	-0.0033 *** (0.000)
性别		0.0479 *** (0.009)	0.0497 *** (0.008)	0.0578 *** (0.009)
受教育年限		0.0069 *** (0.001)	0.0048 *** (0.001)	0.0051 *** (0.001)
政治身份		-0.0086 (0.011)	-0.0021 (0.011)	0.0043 (0.015)
宗教信仰		0.0181 ** (0.022)	0.0318 (0.018)	0.0363 (0.020)
健康水平		0.0124 *** (0.004)	0.0080 (0.003)	0.0099 * (0.004)
技术培训		0.0197 (0.016)	0.0216 (0.015)	0.0242 (0.018)
婚姻状况		-0.0305 *** (0.011)	-0.0319 ** (0.011)	-0.0336 ** (0.013)
相对收入		0.0116 *** (0.004)	0.0122 *** (0.003)	0.0141 *** (0.004)
外出务工单位		0.1463 *** (0.020)	0.1601 *** (0.019)	0.1587 *** (0.021)
经济发展水平			0.0112 (0.016)	0.0103 (0.019)
基础设施			0.0439 *** (0.015)	0.0488 *** (0.017)
市场化程度			-0.0251 (0.068)	-0.0284 (0.074)
对外开放度			0.0058 (0.004)	0.0068 (0.005)
城市变量			-0.0223 (0.021)	-0.0249 (0.024)
地区固定效应	N	N	Y	Y
拟 R^2	0.0063	0.1092	0.3034	0.2936
N	8346	8346	8346	8346

注：***、**、*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系数为边际效应；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其创业资源的积累作用极为有限。政治身份、宗教信仰和健康水平等个体差异并不会对农民创业行为造成实质影响。而受教育年限和相对收入对农民创业决策的正向作用基本符合常识逻辑，这里亦不赘述。

宏观因素方面，基础设施水平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提升了农民开展自主创业活动的概率。完善的基础设施降低了交易成本，带来的集群效应和溢出效应为农民创业提供了极大便利。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当地经济生产规模和发展阶段对个体创业决策的推动力不足。城市变量与农民创业行为也没有必然联系，侧面印证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结果。加之同样不显著的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度，以上事实表明农民的创业决策主要取决

于自身要素禀赋,宏观环境并非决定农民创业行为的关键因素。

2. 异质性分析

返乡农民工对所处环境的主观认知与价值判断是决定其创业与否的重要因素。由表3前两列可以看出,生活幸福^①的返乡农民工有较大的概率开展自主创业活动。幸福感较高的村民一般拥有强大的理性分析能力和积极乐观心态,这些个体对创业失败的容忍度与承受力更强。同时,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往往伴随着丰裕的物质生活和通达顺畅的社交网络,能够提供创业所需的初始禀赋和信息渠道,有助于缓解创业初期面临的投融资约束^[25-26]。因此,拥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提高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积极性。此外,认为生活不公平的村民表现出意料之外的创业热情。我们猜测,主观公平感衡量了当前生活质量与努力工作程度之间匹配度的自我感知。匹配度较差的村民往往对现有生活处境感到强烈的不满,激发了他们寻找高收入工作和改变现状的主观能动性。自主创业正是短期实现收入快速增长和社会阶层迅速跃升的有效途径,理所应当被纳入该类群体的选择菜单。因此,主观公平感较低的返乡农民工有较大的概率选择自主创业。

表3 农民工个体特征与返乡创业

变量	幸福	不幸福	公平	不公平	技术培训	未技术培训
外出务工经历	0.0324*** (0.012)	0.0206* (0.011)	0.0193* (0.011)	0.0349*** (0.013)	-0.0116 (0.024)	0.0308*** (0.010)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宏观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拟R ²	0.1406	0.1227	0.1424	0.1304	0.1982	0.1305
N	5143	3203	4230	4116	435	7911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系数为边际效应;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返乡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其自主创业决策和绩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7-28]。职业技能培训是农民工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渠道。对于未参加过技术培训的村民而言,外出务工经历在1%的显著水平下促进其自主创业决策,该路径对参加过技术培训的群体则不显著。一方面,雇主对花费资金培训的农民工表现出长期雇佣的期望,可能会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限制农民工离职和返乡创业。同时,经历技术培训使农民工掌握了多维度的劳动技能,收入水平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必然会得到提升。对于他们而言,放弃稳定且高收入的现有工作而选择风险较大的创业活动的机会成本是不得不反复斟酌的难题。因此,对于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民工个体,外出务工经历对其创业行为的作用方向尚需谨慎回答,使得旨在提升人力资本的技术培训反而成为阻碍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因素。

良好的创业环境是孕育返乡农民工创业项目的催化剂^[29]。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商业氛围、金融体系及制度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探究地区差异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异质性影响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上面虽提到宏观环境并不是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关键因

① 调查问卷对生活幸福感分别赋值1—5,对应着“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由于主观认知存在一定的界定模糊,本文将明确回答“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村民界定为生活幸福的样本。其他村民界定为生活不幸福的样本。同理,生活公平感的划分依据也采取类似的处理方式。

素，但我们仍想通过分区域的经验研究，探索不同地域因融资环境、创业氛围、市场化水平等软实力而导致的创业行为差异。从表4可以看到，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外出务工变量都至少在10%的显著水平下促进了返乡农民工创业，而中部地区的回归系数则不显著。从系数上看，外出务工对目前处于西部地区的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激励作用大于东部和中

表4 农民工创业地区与返乡创业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外出务工经历	0.0271* (0.016)	0.0031 (0.013)	0.0303*** (0.011)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宏观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Y	Y	Y
拟R ²	0.1656	0.1606	0.1441
N	3330	2246	2770

注：***、**、* 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系数为边际效应；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部地区。这是因为东中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金融系统对小微创业者的扶持力度较大，创业信息的交流渠道相对通畅，创业氛围和产业集群效应更加明显，农民实施创业活动所面临的政策阻力和资金约束较小。另外，正是由于东中部地区已具备良好的创业基础和实践平台，外出务工经历对于农民迈过创业门槛“第一步”的提升效果反而有限，对于创业行为选择的边际效用有了一定的局限性。而对于西部地区的农民而言，外出务工期间积累到丰富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解决了当地创业先天条件不足的问题。因而西部地区外出务工经历与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表现出意料之外的正相关关系。

3. 稳健性检验

为了评估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净效应，同时减少截面数据中个体行为的自选择偏差，下面将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创造一种近似随机实验的环境。常用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有最近相邻匹配、半径匹配与核匹配三种。虽然三种匹配方法在不同情境下各有优劣，但对于大样本得到的实证结果，以上方法应该是大致等效且互为印证的。囿于篇幅，这里仅给出基于最近相邻匹配法的分析过程。由表5可知，个体特征、家庭因素和宏观变量均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农民工外出务工决策。显然，是否选择外出务工并非农民的随机行为，这将导致样本在返乡后的创业决策出现选择性偏差。

表5 外出务工决策的影响因素

变量	模型1		模型2	
	估计系数	P 值	估计系数	P 值
年龄	-0.0225***	0.000	-0.0230***	0.000
性别	0.4552***	0.000	0.4513***	0.000
受教育年限	0.0214***	0.000	0.0305***	0.000
政治信仰	-0.2025***	0.008	-0.2473***	0.002
宗教信仰	0.0140	0.774	0.0587	0.241
健康水平	-0.0152	0.395	-0.0010	0.956
技术培训	-0.1029**	0.044	-0.0751*	0.095
婚姻状况	-0.0421	0.447	-0.0471	0.402
相对收入	-0.1401***	0.000	-0.1310***	0.000
外出务工单位	-0.1653***	0.000	-0.2442***	0.000
经济发展水平			-0.5623***	0.000
基础设施			-0.1094**	0.016
市场化程度			-1.9431***	0.000
对外开放度			0.0380***	0.002
城市变量			0.0102	0.878
常数项	0.8151***	0.000	7.2185***	0.000
地区固定效应	N		Y	
拟R ²	0.0849		0.1117	
N	8346		8346	

注：这里采用Probit回归模型；***、**、* 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在得到外出务工的倾向得分后，还需进一步验证匹配的共同支撑域和匹配效果。通过计算个体的倾向得分，依据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将所有样本分为两组并进行匹配比较。观察匹

配前后的核密度函数效果图可知,外出务工与在家务农的倾向得分有较大范围重叠(见图1)。同时,控制组在匹配前呈现明显的左偏形态,处理组的偏移程度则相对正常,两组的倾向得分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两组样本在面临外出务工决策时的影响机制存在偏差。经过最近相邻匹配后,相关变量的分布特征变得较为相似,可以认为倾向得分匹配极大地修正了组间协变量分布的差异,消除了样本选择偏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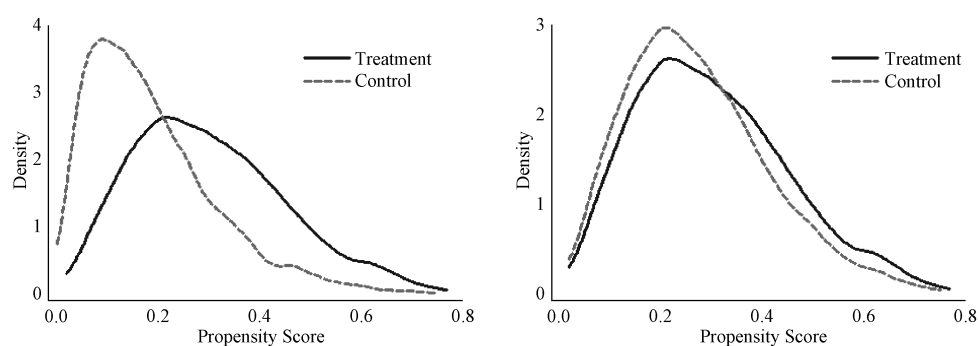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最近相邻匹配前(左图)、后(右图)核密度函数

接下来,基于最近相邻匹配、半径匹配与核匹配三种方法估计了外出务工对返乡创业行为的平均处理效应(ATT)。通过对比表6中处理组和控制组匹配前后的创业行为差值及显著性水平,再次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在不低于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提升了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在分离出其他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因素后,基于PSM估计的实证结果依旧稳健。

表6 基于PSM估计的处理效应结果

匹配方法	样本类型	处理组	控制组	类值	S. E. 值	T-stat 值
最近相邻匹配	Unmatched	0.1518	0.0994	0.0525	0.0084	6.26***
	ATT	0.1518	0.1241	0.0278	0.0134	2.07**
半径匹配	Unmatched	0.1518	0.0994	0.0525	0.0084	6.26***
	ATT	0.1518	0.0994	0.0525	0.0090	5.81***
核匹配	Unmatched	0.1518	0.0994	0.0525	0.0084	6.26***
	ATT	0.1518	0.1240	0.0278	0.0099	2.82***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具体控制变量如表1所示。

此外,为了进一步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采用了以下三种检验策略:第一,调查问卷最后附有访问员自填项目,通过观察访问期间受访者的举止与心态变化,判断其合作程度及样本可信度。这里剔除了访问员认为受访者不合作和不可靠的样本。第二,鉴于地市级数据受宏观环境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冲击较大,容易出现系统性波动。同时,宏观经济指标作用于个体创业行为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里以观测期前三年相关变量的平均值进行替换。第三,为了得到适用于中心位置的分布特征,本文还剔除了直辖市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样本,以进一步检验相关结论的普适性,具体结果见表7前三列。可以看到,经过三种检验策略处理后,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促进作用依旧显著,作用强度与基础回归保持一致,说明我们的实证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在处理内生性方面，本文控制了个体特征和地区固定效应，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模型设定与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挑战，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民自主创业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即本身就有强烈创业意愿的农民更有动力通过外出务工来学习管理经验与拓展人脉。这里借鉴谢勇和杨倩的思路^[7]，以本村外出务工氛围作为个人外出务工经历的工具变量。在从众心理作用下，浓厚的外出务工氛围将较大程度地刺激村民外出务工决策，两者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同时，村级数据受个体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微乎其微，确保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我们以本村除本人外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人数占本村总人口数衡量外出务工氛围，并通过 IVprobit 模型估计模型参数。同时，我们还设计了安慰剂检验论证返乡农民工创业是由于外出务工经历而非其他因素决定。具体做法是，随机打乱全部样本的外出务工变量顺序，生成该变量对返乡创业行为的随机冲击并重复 400 次，通过估计核心变量的回归系数是否发生改变，识别外出务工变量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解释效力。很明显，基于 IVprobit 模型的核心变量显著性与作用方向并未出现大幅变动；安慰剂检验亦排除了“其他个体特征因素而非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原假设，进一步验证了实证结果是稳健有效的。

表 7 稳健性分析结果

变量	样本筛选	宏观平稳化	去除极值	IVprobit	安慰剂检验
外出务工经历	0.0293 *** (0.010)	0.0277 *** (0.009)	0.0253 ** (0.010)	0.0789 ** (0.726)	-0.0065 (0.013)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宏观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Y	Y	Y	Y	Y
拟 R^2	0.1335	0.1319	0.1368	0.0814	0.0129
N	8110	8346	7191	7921	8346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系数为边际效应；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五、邻里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

1. 邻里关系的支持效应

正如研究假设所言，邻里关系是考察外出返乡后，农民工是否开展创业活动的关键因素。对于邻里关系，我们将其分为邻里熟悉度、邻里信任度、邻里互助度三个维度，分别以问卷中“您和本社区（村）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您对本社区（村）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信任吗？”、“您与本社区（村）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互相之间有互助吗？”进行定义。通过分别在原模型中加入外出务工经历与三类邻里关系的交互项，检验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是否受邻里支持效应的影响。此外，我们还构建了一个相对外生的支持效应替代指标，借鉴余丽甜和詹宇波及前面构建工具变量的思路^[30]，选择本村范围内除该家庭外的医疗支出占全年家庭总收入比重的平均值衡量广义范畴内的邻里关系。交互项去中心化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从表 8 中不难看出，外出务工经历和邻里熟悉度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均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加入两者的交互项后，回归系数在 5%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邻里之间交流越频

表8 邻里关系的支持效应检验

变量	(1)	(2)	(3)	(4)
外出务工经历	0.0153 *** (0.003)	0.0076 * (0.004)	0.0163 *** (0.004)	0.0865 * (0.052)
邻里熟悉度	0.0064 *** (0.003)			
外出务工经历 * 邻里熟悉度	0.0027 ** (0.001)			
邻里信任度		0.0097 * (0.005)		
外出务工经历 * 邻里信任度		0.0087 * (0.006)		
邻里互助度			0.0122 *** (0.004)	
外出务工经历 * 邻里互助度			0.0120 * (0.006)	
广义邻里关系				0.0261 ** (0.013)
外出务工经历 * 广义邻里关系				0.0672 ** (0.029)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宏观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Y	Y	Y	Y
拟 R^2	0.1327	0.1332	0.1346	0.1344
N	8346	8346	8346	8346

注：***、**、*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系数为边际效应；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繁，农民工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其返乡创业行为的促进作用越强。邻里信任度对于返乡农民工创业同样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随着邻里间价值观念与诚信规范的行为准则不断强化，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逐渐增强。进一步地，互惠互助的邻里关系不仅提高了返乡农民工创业概率，还正向调节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激励作用。使用工具变量的 IVprobit 模型显示，和谐友善的邻里关系依然显著提高了返乡农民工创业概率，且作用于外出务工变量对创业行为的正向调节效应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前述估计结果是有效可信的。

2. 邻里关系的同群效应

邻里间的同群效应源于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群体内部的互动关系导致个体间类似的创业态度和风险偏好度。借鉴刘斌的思路^[24]，以所在村落除自己以外的平均创业率衡量个体受到邻里间同群效应的影响。加入主效应项和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如表 9 第（1）列所示。农民身处活跃的创业环境对其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周围创业氛围的不断浓厚，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从而验证了邻里关系在返乡农民工创业中的同群效应。农民工返乡后拥有高于留守村民的物质财富和营销网络，所缺乏的恰恰是从事自主创业的拼搏精神和创业相关的管理经验。周围邻里中的创业成功者不仅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了学习交流的机会，还可以借助社交网络与技术溢出效应实现创业资源的高效整合，从而提升了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成功率。

表9 邻里关系的同群与示范效应检验

变量	(1) 全样本	(2) 低	(3) 差不多	(4) 高	(5) 全样本
外出务工经历	0.0268 *** (0.008)	-0.0094 (0.011)	0.0337 *** (0.012)	0.0739 * (0.038)	0.0641 * (0.034)
同群效应	0.4189 *** (0.034)				
外出务工经历 * 同群效应	0.0236 ** (0.011)				
示范效应					0.0169 *** (0.006)
外出务工经历 * 示范效应					0.0162 * (0.009)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宏观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Y	Y	Y	Y	Y
拟 R^2	0.2628	0.1260	0.1286	0.1894	0.1372
N	8346	2215	5225	906	8346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系数为边际效应；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3. 邻里关系的示范效应

为了验证研究假设提到的“邻里关系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本文还用到了调查问卷中“您认为自己当前的生活水平与邻居相比，是好些还是差些？”这个问题定义示范效应。鉴于回答结果呈现尖峰厚尾的特征，即绝大多数村民认为自己和邻居的生活水平差不多，回答“低很多”和“高很多”的样本占总样本量不足 5%，所以我们将回答“高一些”和“高很多”合并，并赋值为 1，回答“差不多”赋值为 2，回答“低很多”和“低一些”的样本赋值为 3。数值越大表明该村民在社交群体中的生活质量越差，邻里间的示范效应越强，由此分析相对邻居的主观生活质量认知差异是否会影响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决策。估计结果如表 9 第 (2) — (5) 列所示。

可以看出，尽管通过外出务工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财富，但返乡后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仍不如周围邻居的那部分村民不会作出创业决策，因为自主创业需要丰裕的要素禀赋，这也印证了基础回归中相对收入对农民创业行为的正向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主要出现在认为自己生活质量不低于周围邻居的个体中。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社会阶层跃升的向往以及邻里间的攀比效应，都会激发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的热情，潜移默化间改变农民对未知风险的偏好，从而刺激有外出务工经历且相对富裕的农民进行自主创业活动。最后一列加入示范效应的直接与调节效应项，外出务工变量仍然通过了 10% 的显著性水平。示范效应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推动了农民创业行为，即邻居的生活水平对自身创业决策存在显著的激励效果。重点关注的交互项表明随着村民对物质生活差距认识逐渐清晰、失落与不满情绪的持续发酵，以及努力改变现状的内生动力不断积累，返乡农民工更加渴望借助外出务工期间积攒的初始要素禀赋开展自主创业行为。以上事实表明，随着邻里关系的示范效应提升，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返乡农民工创业为研究对象,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利用微观计量模型对外出务工经历与返乡农民工创业展开深入探讨。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均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返乡农民工创业概率。在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各类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是有效和可信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异质性分析使我们发现了一些反经验结论,如感到公平和有家庭的村民并不会偏好自主创业;技术培训与宏观环境也不是推动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必要条件。相应地,他们更关注个人禀赋的充裕程度。进一步地,本文还重点分析了邻里关系对外出务工经历与返乡创业的调节效应。不同维度的邻里支持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邻里关系中的同群效应与示范效应同样是具备正向调节作用的有效渠道。

上述结论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促进返乡农民工积极创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首先,必须尽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隐形藩篱,清理阻碍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通过建立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和返乡创业的专业服务机构,为农民工创造一个公平和谐的务工环境。通过鼓励农村闲置劳动力进城务工,为返乡创业积累必要的初始资源。其次,加快乡村地区金融系统扶助农民工创业的政策改革进程,建立健全中小微企业融资的相关配套措施,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切实降低初创实体的创业门槛。最后,拓展乡域社会网络,营造和谐融洽的文明乡风,推动价值信念、诚信规范、集体行动等非正式制度建设,使有意向开展创业活动的返乡农民工群体最大限度地获取创业所需的邻里关系嵌入,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率和运营绩效。

参考文献:

- [1] GROVE M. Population density, mobility,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6, 74: 75-84.
- [2] 袁方,史清华.从返乡到创业——互联网接入对农民工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J].*南方经济*,2019(10):61-77.
- [3] 刘玉侠,任丹丹.返乡创业农民工政策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的实证[J].*浙江社会科学*,2019(11):58-64.
- [4] 秦芳,李晓,吴雨,李洁娟.省外务工经历、家庭创业决策及机制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18(4):91-100.
- [5] 杨子砚,文峰.从务工到创业——农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形式升级[J].*管理世界*,2020(7):171-185.
- [6] 徐超,吴玲萍,孙文平.外出务工经历、社会资本与返乡农民工创业——来自CHIPS数据的证据[J].*财经研究*,2017(12):30-44.
- [7] 谢勇,杨倩.外出务工经历、创业行为与创业绩效[J].*经济评论*,2020(1):146-160.
- [8] LYONS E, ZHANG L. Who does (not) benefit from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39(1): 85-112.
- [9] ALBY P, AURIOL E, NGUIMKEU P. Does social pressure hinder entrepreneurship in Africa? the forced mutual help hypothesis [J]. *Economica*, 2020, 87(346): 299-327.
- [10] YU S, ZHANG L. Empirical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ity and Its Applications*, 2016, 10(3): 351-368.
- [11] RAWHOUSER H, VILLANUEVA J, NEWBERT S L. Strategies and tools for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 access: a cross-disciplinary review and typolog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7, 19(4): 473-491.
- [12] 尹志超,刘泰星,王晓全.农村收入差距抑制了农户创业吗?——基于流动性约束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的实证分析

-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 (5): 76-95.
- [13] 王洁琼, 孙泽厚. 新型农业创业人才三维资本、创业环境与创业企业绩效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 (2): 81-94.
- [14] 周广肃, 谭华清, 李力行. 外出务工经历有益于返乡农民工创业吗? [J]. 经济学 (季刊), 2017 (2): 793-814.
- [15] WAHBA J, ZENOU Y.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migr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capital [J].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2012, 42 (5): 890-903.
- [16] 许明. 外出务工经历与返乡农民工创业成功率——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反事实估计 [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0 (4): 70-79.
- [17] ZHAO 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 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 30 (2): 376-394.
- [18] 董磊明, 郭俊霞. 乡土社会中的面子观与乡村治理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 (8): 147-160.
- [19] 黄祖辉, 王雨祥, 刘炎周, 胡伟斌. 消费替代还是信任补偿? ——转移支付收入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研究 [J]. 管理世界, 2020 (9): 97-111.
- [20] 黄洁, 蔡根女, 买忆媛. 谁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机会识别更具影响力: 强连带还是弱连带 [J]. 农业技术经济, 2010 (4): 28-35.
- [21] 晏艳阳, 邓嘉宜, 文丹艳. 同群效应对创业活动影响的模型构建与实证 [J]. 中国管理科学, 2018 (5): 147-156.
- [22] OUMET P, TATE G. Learning from coworkers: peer effects on individual investment decisions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20, 75 (1): 133-173.
- [23] EUN C S, WANG L, XIAO S C. Culture and R²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5, 115 (2): 283-303.
- [24] 刘斌. 同群效应对创业及创业路径的影响——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经验证据 [J]. 中国经济问题, 2020 (3): 43-58.
- [25] 于文超, 陈刚. 主观幸福感与居民创业 [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8 (9): 94-106.
- [26] HOOGENDOORN B, ZWAN P, THURIK R.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 the role of perceived barriers and risk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9, 157 (4): 1133-1154.
- [27] ESTRIN S, MICKIEWICZ T, STEPHAN U. Human capital in 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6, 31 (4): 449-467.
- [28] 董晓林, 孙楠, 吴文琪. 人力资本、家庭融资与农户创业决策——基于 CFPS 7981 个有效样本的实证分析 [J]. 中国农村观察, 2019 (3): 109-123.
- [29] MULLER S, KORSGAARD S. Resources and bridging: the role of spatial context in rural entrepreneurship [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8, 30 (1-2): 224-255.
- [30] 余丽甜, 詹宇波. 家庭教育支出存在邻里效应吗? [J]. 财经研究, 2018 (8): 61-73.

Migrant Work Experience, Neighborhood Relations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Return Migrants

ZHANG Liangliang, LI Shiq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Migrant workers' independent entrepreneurship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perly deal with the resettlement of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he resource endowment accumulated by migrant workers

during their work is the key step to get past the threshold of initial creation. Based on data of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 (CLDS) 2016,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many factors, including migrant workers' experience, on their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making, and focuses on the moderating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perience of migrant worker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probabi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of rural labor force. Compared with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migrant work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bundance of their factor endowment when making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s. For the group with high subjective well-being, strong sense of unfairness, not taking part in short-term technical train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 variable of migrant workers' experience has a higher promoting effect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migrant workers' experi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Neighborhood support effect, group effect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 are effective channels for the moderating effect. The abov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the robustness and endogenous test, which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and realiz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 and talents as soon as possible.

Keywords: migrant work experience; entrepreneurship of return migrants; neighborhood relations; moderating effect

[责任编辑 武 玉]